

# 皖南旅游业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化研究

吴文浩, 占辉斌 (黄山学院, 安徽黄山 254021)

**摘要** 文化是一种在竞争性社会中的相对优势资源。笔者基于文化资本的概念,介绍了皖南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分析了皖南旅游业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化路径、文化资本化的制约因素,就皖南旅游业的文化资本化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强调应均衡文化资本利用和保护的关系,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结合,吸收和传承文化中有利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和价值。

**关键词** 皖南旅游业;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化;文化资本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 S1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34-234-03

## Study on Cultural Capitalization i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Southern Anhui

WU Wen-hao, ZHAN Hui-bin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254021)

**Abstract** Culture is a relative 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ve socie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 the existing forms of cultural capital in southern Anhui were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path, constraints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ourism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nhui were analyze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balanc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ombine cultural and economic capital, absorb and inherit ethics and value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in Southern Anhui;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ization; Sustainable use of cultural capital

旅游的本质和文化在当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促进了文化与旅游日益结合的趋势。旅游是一种不同于旅游者惯常生活的旅行和生活体验,文化对旅游者无疑具有吸引力。文化之旅不仅可以丰富旅游者的生命体验,而且也是旅游目的地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以及实现文化保护和积累的有效形式。

该研究所指的皖南包括安徽省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以及安庆市所辖的潜山县“六市一区”区域,即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范围。作为文化和旅游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皖南的文化旅游问题受到了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皖南旅游的开发模式<sup>[1-2]</sup>、旅游的环境影响<sup>[3]</sup>、皖南古村落的旅游开发<sup>[4-5]</sup>等方面。

皖南是文化资源富集的区域,以徽州文化、九华山佛教文化为其杰出代表,地方性特征鲜明。皖南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起步最早的区域之一,在旅游业发展之初就提出了“打黄山牌,做徽文章”,自然与人文两翼齐飞的旅游发展思路。2014年制定的《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以文化作为皖南示范区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至今,皖南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化战略一以贯之,文化旅游比重不断上升,旅游发展中的文化优势不断显现。然而,在推进文化资本化过程中,一方面,文化资本要素的旅游经济价值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利用中的一些特殊问题、特殊矛盾成为旅游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基于理论研究的现状和皖南旅游发展现状、旅游发展目标,笔者将运用文化资本概念,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角度探讨皖南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利用方式和文化可持续利用的方向。

## 1 皖南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

资本是以获利为目标、被投资和被动员的资源,它既是生产的结果,又是生产的因子<sup>[6]</sup>。文化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累积,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文化资本兼具文化和资本的特征,它既有文化的形式和价值,又有经济财富的特征和禀性。作为资本,文化具有资本最本质的特性,即增值性,可带来利益;同时还具有稀缺性,是一种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取利益的相对优势资源。文化资本要实现经济增值,必须投入流通和交易,文化的资本化是文化作为资源被运用、被动员于逐利的过程。

皖南地域文化是自然、经济、人文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上的徽商和徽州文化使皖南的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和显赫,并彰显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些累积并不断延绵的历史文化以各种方式坚韧地留存于现代生活之中,成为地方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既定因素和文化遗产资源。

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分为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和体制的形式,笔者对皖南文化资本存在形式的分类也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分类方法(表1)。

表1 皖南文化资本的分类

序号	类别	皖南文化资本形式的表现
1	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皖南各地的民俗、民间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戏曲舞蹈、民间体育运动杂技、民间传统手工技艺、地方知识等,以及体现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方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2	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	现存的古村落、古道古桥古坝、历史建筑、历史文化遗址;农业生产遗址、传统生产工具;图书、绘画、文献、艺术品等,以及体现于客观形式文化资本中的地方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3	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	即“体制上认可的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地方文化得到国家或社会认可,或颁发的证书、称号、荣誉等

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或可称为“身体化”、“肉身化”的文化资本,它是通过教育、传承、一定文化环境中的潜移默化等方式内化为具体个人的文化、知识、趣味、品性、价值观等。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载体”即是人自身,其文化资本的外显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09-10D103);黄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15xhwh003);安徽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SK2015A167)。

**作者简介** 吴文浩(1966-),女,安徽歙县人,副教授,从事公共经济、经济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15-11-06

和展示也直接依赖于它的拥有者个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表现能力,这也决定了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依附于它的拥有者的人的生物性特征,决定了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有着与这种形式资本的承载者相同的生物局限性,即它会随着其拥有者的衰落、消亡而衰落、消亡<sup>[7](8-10)</sup>。皖南现今大量留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属此类,如皖南各地的民俗、民间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戏曲舞蹈、民间体育运动杂技、民间传统手工艺、地方知识等。

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即以有形的物质实体形态存在的,蕴涵文化特性、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本。皖南现存的古村落、古道古桥古坝、历史建筑、历史文化遗址;农业生产遗址、传统生产工具;图书、绘画、文献、艺术品等都是这一形式的文化资本。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同时具有物质形态和文化内容,如一幅画,不仅具有物质载体的外观,而且承载了相关的文化信息、知识和对画的“消费”方式。而且,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其物质性和文化性方面的传承不是同步的,物质性方面可以被传承,其文化内容的传承可能会中断<sup>[7](11-13)</sup>,使文化资本只留下当代人无法完全文化解码的物质形态外壳。

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即“体制上认可的文化资本”,体现为一些文化资本得到国家或社会认可或颁发的证书、称号、荣誉等,这些证书、称号、荣誉本身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资本形态。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是对前两种形式文化资本在体制上的认可,但它不同于前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既可以突破具体化形式文化资本所存在的与其承载者相同的生物局限,也可以避免客观形式文化资本因其物质载体毁损而毁损的风险,从而使原有的文化资本价值得到保障。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独立存在形式的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还在于“体制上的认可”使文化资本获得了一种“社会公认性”的权力,使它与一般的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的差别,从而使原有的文化资本价值得到保障并增值<sup>[7](13-14)</sup>。受“体制认可”的、“社会公认性”的权力不仅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且促进了文化资本形象传播,使得文化资本附积了新的潜在利益和价值。在皖南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得到了历史上或当今国家社会在“体制上的认可”,在旅游发展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如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黄山、西递古村落,被誉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体制认可”的光环促进了这些景区景点的旅游发展。

## 2 皖南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化路径

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化,即以文化资源的动员和运用促进旅游发展,并在旅游发展中实现文化自身的保护和积累。皖南旅游的文化资本化路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2.1 以文化资源为要素,建立可游览的文化景点和文化景观

远去的历史,迥异的地方文化是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的最好吸引物。皖南有安徽最密集的文化历史遗产,如徽州文化洋洋大观,戏曲文化、茶文化雅俗共赏,铜陵古铜矿遗址是

皖南工业文明的见证。随着皖南旅游的发展,这些历史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作为旅游资源,通过旅游景区和景点建设方式得到利用和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的投资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范围内知名的旅游景点,黄山、九华山、齐云山、西递、宏村、屯溪老街、花山谜窟等全国知名,还有其他众多的大小小的文化景点。文化景点景区的建设是皖南旅游发展中最早、最直接的文化资本化方式。

### 2.2 将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旅游市场营销过程,树立和传播可感知的地域文化形象

市场营销是连接旅游供给和旅游需求的必要手段,地域文化形象是对地方文化的展示和表达,鲜明而个性的地方文化形象便于旅游者快速识别,利于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因而会促进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在旅游发展中,皖南各地通过节事节庆活动、旅游推广、各种地方文化比赛等,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旅游市场营销的过程中,塑造和传播了皖南地方文化形象。

### 2.3 文化资本与地方城市乡村建设、民众生活风尚相结合,营造可体验的旅游目的地地方文化环境和氛围

如在城乡规划和城乡环境建设中,将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展现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博物馆建设、古文化古建筑的保护、城乡建设中地方文化元素的运用等,使地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出明亮的光彩,越来越多的传统民俗得到尊重和传播,这些做法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大众化和自由行旅游的到来。

### 2.4 文化资本与其他产业相融合,生产可购买的旅游纪念品

购买是旅游链中的重要一环,兼具实用价值和地方文化特色、文化价值的地方产品,促使旅游者产生购买动机和购买行为,因而可以提高目的地的旅游总收入。皖南的一些生产企业深谙此道,从历史传统文化中挖掘可以利用的资源,寻找产品创新的灵感,面向当代旅游市场需求,将传统的文化元素、生产技艺运用于产品生产之中。如一些企业针对旅游者旅游购物的需求,将传统饮食文化、茶文化和茶叶生产技艺、徽州“三雕”的文化和技艺等融入旅游产品的生产中,生产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可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广受旅游者青睐。

## 3 皖南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化制约

### 3.1 文化资本的利用不足,而且利用形式单一

皖南是文化资本的聚集区域,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不仅数量多,而且知名度高,对这些文化资本的运用,促进了皖南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设立之后,皖南更是成为安徽旅游的核心区域。但丰富的文化资本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多,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少;物质形态展示多,文化精神内涵体现少;参观式、游览式的旅游产品多,而参与式、体验式的旅游产品少;旅游核心区文化旅游项目多,非核心区的文化资本利用少。对文化资本的利用还主要停留在易于开发的产品上,旅游中对文化只是简单的展览式的展示,文化旅游的开发和游客的旅游体验较多地处于物质层面的内容,文化的内涵、文化的精神内髓在旅游中彰显不足,游客对文化符号的需求层次较浅,东道主对文化符号

的认知层次也较浅<sup>[8]</sup>。

### 3.2 资本与文化的矛盾造成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保护和积累问题

因资本扩张发生的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利于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文化繁荣;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追求利润过程的是文化的堕落和文化生产质量、水平的不断下降<sup>[9]</sup>。因此,文化保护是旅游发展中文化利用的另一方面,文化资本通过旅游发展中的运用,可以给地区发展带来机遇和利益。但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文化资本利用也可能会导致文化的商品化趋向,在追求经济利益中忽视了文化发展的逻辑,造成对文化资本的破坏。这种对文化的破坏在皖南旅游发展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地方文化的曲解、伪造,出现“伪文化”、“伪文物”,违背文化的真实性<sup>[10]</sup>;二是旅游发展中,受认识和技术所限而造成对文化的“建设性”破坏,即在旅游的名义下,甚至以文化保护之名,对历史文化遗产随意改建、拆建、拆旧建新;三是由于游客行为,特别是在旅游拥挤的情况下,过多的旅游者给文化环境造成压力。由于文化资本的重要文化功能和不可再生性特征,旅游发展如果不能同时实现文化资本的有效保护,不仅会影响文化旅游体验的审美和完整性,更严重的还会造成作为人类生存条件之一的文化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文化遗产的遗失。

### 3.3 忽略了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的挖掘、传承和再塑造

文化中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等因素对经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韦伯、弗朗西斯·福山等的著作中都做了富有洞见的阐述。迈克尔·波特则将那些影响人们经济活动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定义为“经济文化”,其中,一些“经济文化”有助于生产率和经济繁荣,而另一些“经济文化”则会损害生产率和经济的繁荣,要实现生产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在全社会推行那些有助于生产率和经济繁荣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使之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sup>[11]</sup>。作为价值观念的文化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一些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可能会不利于甚至阻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另一些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则会促进或有利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如皖南一些传统民俗中体现的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历史上的徽商在经营中恪守的诚信理念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对当今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仍有促进作用。目前的皖南旅游重视传统文化作为旅游投入要素的运用,对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对旅游的重要影响认识不足。

## 4 皖南旅游业的文化资本化发展建议

文化资本从质和量两方面影响着人类的生产能力<sup>[12]</sup>。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本为皖南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相对优势,它也是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先天禀赋。旅游的发展也成为皖南地方文化资本的最好展示。文化旅游项目、文化旅游营销、目的地的地方文化环境建设和文化旅游纪念品,使得皖南潜在的文化资本得到利用,在旅游发展中实现文化价值到经济价值的转换。但文化资本利用不足,利用形式单一,文化资本的传承保护问题依然明

显,对这些问题的破解考验着皖南今后文化资本化的能力和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均衡文化资本利用和保护的关系,实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与一般的物质资本不同,而与自然环境类似,它除了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能够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投入经济活动的特征外,更重要的是,文化资本承担了人类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功能。文化自身的文化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运行有支撑作用,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选择<sup>[12]</sup>;同时,一些历史遗产还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因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观是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即文化资本的利用和旅游的发展,要以对文化不构成破坏的威胁为前提。为此,需根据皖南旅游中文化资本利用的情况,区分不同的区域,区别对待:对一些文化保护、文化环境压力较大的旅游区,实行旅客的控制和科学管理,以减轻文化保护的负担;对文化资本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区域,采取措施鼓励文化旅游的发展,使文化资源得到最佳配置。

(2)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结合,并加强地方历史文化的教育、研究和培训,提高文化资本的利用能力。文化遗产将替代传统资源,成为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生产要素,但文化资本的利用程度如何,取决于人们在旅游发展中“创新性地利用和诠释过去的的能力”<sup>[13]</sup>。文化资本只有在真正被理解的基础上开发成能够满足当代旅游需求的旅游吸引物时,才能成为现实的使旅游受益的生产要素,这就需要将历史文化的发展逻辑与旅游发展的商业逻辑相结合,一方面,重视和加强皖南地方历史文化的教育、研究和传承,真正理解皖南地方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还需要引入经济资本和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将对文化的理解和资本、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皖南文化资本的利用能力和实现皖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吸收和传承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和价值观,为皖南旅游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构建深厚的信念和价值观体系。作为要素的文化和作为观念的文化都是旅游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地方文化可以成为旅游生产要素和旅游吸引物,而且旅游的发展也需要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旅游发展的伦理基础。因此,需要将传统伦理、价值观与现代旅游发展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和再建构中,使之成为皖南旅游发展在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上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1] 朱国兴. 区域旅游线路开发设计:以皖南旅游区为例[J]. 皖西学院学报, 2001(4): 105-108.
- [2] 程晓丽, 胡文海. 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模式[J]. 地理研究, 2012(1): 169-177.
- [3] 黄薇薇, 丁雨莲. 皖南乡村旅游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研究:以西递、宏村为例[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 24-27.
- [4] 卢松, 陆林, 凌善金, 等. 皖南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初步研究[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3(4): 71-72.
- [5] 徐艳. 皖南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研究[D].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 2009.

人积累的资本尚不足以支付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

新生代农民工怀揣对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城市就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站稳脚跟,但在激烈的工作竞争中自身竞争力不足已严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生涯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教育水平虽已得到很大提高,但尚未具备较为专业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导致他们无法胜任高端前沿行业,大部分就业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 3 助推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的政策建议

**3.1 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合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定居** 截至2012年底,中国有建制市657个,中小城市占比81%,总人口达10.1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5.2%,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6.8%,另外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区域的城市化率仅为35.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sup>[13]</sup>。相较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还明显滞后。现阶段中小城市应依托大城市辐射效应,通过产业承接来增加城市就业岗位,并不断完善城市相关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在定居地更好的发展提供政策环境。另外,需结合自身特色来构建城市发展蓝图,挖掘城市内在潜力,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对生活产生的改变,并坚定城市定居意念。

**3.2 继续深化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 改革进入深水区,滞后于社会现实要求的城乡二元制度成了改革的拦路虎。地方政府应主动割断农民工进城的后顾之忧,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退出补偿机制。再者,全面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应是通过更加系统的顶层设计与户籍相联系的福利体系、公共服务的全面改革,为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创造条件。

**3.3 加强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竞争力**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追求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够组织开展技能培训<sup>[14]</sup>。基于中国逐步从“人口红利期”向“后人口红利期”转变的大背景,政府和用人单位应强化对人力资源重要性和职业培训必要性的认识。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推进培训机制创新,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职业培训体系。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立立体式全方位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农民工的道德意识、人文素养、科学文化水平,将其培养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3.4 完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城市包容度,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中小城市应努力营造“身份无高低、职业无

贵贱”的良好社会氛围,消除行业歧视,尊重为城市发展付出辛苦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的认知错位,还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双方平等对话交流,增进互信和了解,打破“心理隔离墙”。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服务政策,让其平等享受市民化待遇。同时要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融入本地生活圈,引导他们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探索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动机制。此外,还需要逐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在住房上给予他们应有的城市生活尊严。

### 4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突破城镇化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做出中小城市定居的决策。成功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必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吸引带动更多的“身边人”,掀起一股中小城市定居潮。在中小城市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首选定居地的大趋势下,各级政府部门应未雨绸缪,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要,逐步消除制度壁垒,努力营造包容的人文环境,帮助落户移民塑造市民身份,促进新移民尽快实现城市融入。

### 参考文献

- [1] 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66, 3(1): 47 - 57.
- [2] 孟习贞. 外来农民工落户经济强镇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统计, 2012(11): 19 - 20.
- [3] 韩雪, 张广胜. 预期就业风险、就业动机与进城务工人员就业选择行为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4(6): 79 - 90.
- [4] 费喜敏, 王成军. 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14(3): 40 - 44.
- [5] 季莉娅, 王厚俊, 杨守玉, 等. 广州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定居意愿调查研究[J]. 南方农村, 2014(12): 16 - 22.
- [6] 辜胜阻, 郑超, 曹誉波.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均衡城镇化的战略思考[J]. 人口研究, 2014(4): 19 - 26.
- [7] 余华义, 唐翔. 中国36个大城市相对消费价格指数测算: 兼对国内宾大效应的实证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15(4): 22 - 35.
- [8] 潘华. “回流式”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机制及其逻辑[J]. 社会建设, 2014(2): 19 - 26, 35.
- [9] 杨本建, 王璐. 地方政府合作能否推动产业转移: 来自广东的经验[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93 - 208.
- [10] 马西恒. 城市社会的隐忧: 国有、集体企业的二元用工制度[J]. 社会, 1995(9): 14 - 16.
- [11] 农民工市民化, 卡在哪儿[J]. 决策, 2011(9): 22 - 24.
- [12] 李卫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0(3): 20 - 22.
- [13] 牛凤瑞, 白津夫, 杨中川. 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
- [14]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课题组.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2(6): 5 - 22.

(上接第236页)

- [6]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
- [7] 包亚明.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89 - 211.
- [8] 汪天颖, 陆林. 路幸福. 徽州村落旅游中游客及东道主的凝视行为[J]. 旅游学刊, 2015(4): 23 - 32.
- [9] 张鑫. 资本与文化的现代性悖论[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1): 152 - 157.
- [10] 刘昌雪, 汪德根. 皖南古村落可持续旅游发展限制性因素探析[J]. 旅

- 游学刊, 2003(6): 100 - 105.
- [11] 迈克尔·波特. 态度, 价值观, 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C]//赛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43 - 61.
- [12] 戴维·思罗斯比. 文化资本[C]//薛晓源, 曹荣湘.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547 - 562.
- [13] 玛丽亚·杨森·弗比克, 格达·K·普里斯特利, 安东尼奥·P·罗素. 旅游文化资源: 格局、过程与政策[M]. 孙业红, 闵庆文, 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1 - 17.